

文史哲研究丛刊



慧皎《高僧传》研究



纪 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慧皎《高僧传》研究

纪 贇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慧皎《高僧传》研究/纪贇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5140-8

I. 慧... II. 纪... III. ①佛教-史籍-研究-中国②僧侣-列传-中国 IV. B949.2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7467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慧皎《高僧传》研究

纪贇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60,000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5140-8

B·652 定价: 49.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范围、目的	7
第二节 研究综述	10
第一章 《梁传》的作者研究	22
第一节 生平研究	22
第二节 慧皎著述考	29
第三节 《梁传》的撰写时间	33
第四节 慧皎的身份对《梁传》的影响	35
第五节 大乘立场对《梁传》的影响	40
第六节 地域因素对《梁传》的影响	42
第二章 《梁传》撰写的史学背景分析	46
第一节 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	46
第二节 中国传统史学对《梁传》的影响	49
第三节 齐梁时期佛教史学的发展	59
第四节 僧团形成和佛教文献整理对《梁传》的影响	65
第三章 《梁传》的文献学研究	72
第一节 《高僧传》的题名	72
第二节 《梁传》的版本研究	88
一、汤用彤整理本《高僧传》的再探讨	88
二、高丽藏本《高僧传》发覆	101
第三节 《梁传》的历代著录	112
第四节 《梁传》的分卷	114
第五节 《梁传》的分科、人数统计	117
一、《梁传》分科的渊源与成就	117

二、《梁传》收录高僧数目的统计	122
三、正传与附传的体例	129
四、各科分析	131
第六节 《梁传》传主名称研究	145
第四章 《梁传》与早期传记类资料之史源学研究	151
第一节 《梁传》与别传类资料之比较研究	151
第二节 《梁传》与总传资料之史源学研究	167
第三节 《梁传》与其他一些传记资料的比较研究	181
第四节 僧徒碑志铭刻类材料	187
第五节 《梁传》与《名僧传》	198
第六节 《梁传》与经录类史源推考	234
第五章 《梁传》与史地类著述之比较研究	253
第一节 《梁传》与外典史籍	253
一、《晋书》与《梁传》	254
二、《宋书》与《梁传》	259
三、《南齐书》与《梁传》	264
四、北朝史料与《梁传》	266
第二节 地志、塔寺记、佛牙记	269
小结	277
第六章 《梁传》中的神异与法术研究	279
第一节 《梁传》中的神异研究	281
一、《梁传》中的轮回与果报	281
二、《梁传》中的神异以及早期佛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 冲突	287
三、《梁传》中的佛经类型与神判分析	291
四、《梁传》情节中的佛经母题	298
第二节 《梁传》中的巫术研究	306
一、《梁传》中的咒术与求雨	310
二、《梁传》中的咒术与佛教医学	314
第七章 《梁传》的总体研究	323
第一节 《梁传》材料方面的修订	323

第二节 《梁传》与《唐传》的史料重叠部分研究	332
第三节 《高僧传》文本及其中部分故事的演变和流传	338
第四节 《梁传》的艺术成就初探	352
一、合理的结构安排	352
二、简约洗练的文风	361
三、鲜明的人物性格	362
四、浓烈的感情色彩	369
参考书目(依编撰者姓氏或书名拼音为序)	371
后 记	376

引 言

中国的古代历史,尤其是汉唐时期错综复杂的观念世界,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历史记载和研究专著,这种资料文献上由于时代的久远而必然造成的逸失^①,以及由于资料整理者个人的偏好而造成的取舍的偏颇^②,都必然会使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产生障碍。也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今日对佛教于中古社会的巨大影响缺乏真实而全面的认识。这些缺失在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对佛教内典中史学撰述的研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重见天日,使我们对于那段几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的历

① 这种情况可以以隋代牛弘所言历代图书之五厄来说明,具体的劫难包括:“秦皇驭宇,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按指汉献帝)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縑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聪)、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南朝梁时有侯景之乱,“萧绎遣将破灭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图书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见魏征《隋书·牛弘传》,中华书局,页1297—1300,1973年。明朝胡元瑞接牛弘之说,补论“十厄”:其六,隋朝藏书盛于开皇,不久毁于杨广之手;其七,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不久毁于“安史之乱”(755);其八,唐后期,肃代二宗荐加汇集,唐末战乱,复致荡然;其九,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1041—1048),再盛于宣和(1119—1125),而遭女真“靖康之灾”(1126);其十,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1174—1189),再盛于嘉定(1208—1224),而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1228)。以上可参考《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经籍会通》;另可参陈登元《古今典籍聚散考》卷一《政治卷》、卷二《兵燹卷》,上海书店,页29—297,1983年;李致忠、周少川、张本早《中国典籍史》第八章《典籍的流散》,世纪出版集团,页445—467,2004年。

② 这一种情况可以以欧阳修对《旧五代史》和《旧唐书》中佛教记录的删除作为例子。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儒家道德伦理观无疑占据了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宋代以后更是如此,尤其是像欧阳修这样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的具有无限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于佛教的偏颇[他在这一点上非常像韩愈,偏激的态度二人不相上下,如欧就有“千年佛老贼中国”(《文忠集》卷二《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以及“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最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文忠集》卷十七《本论下》)之句],在中国中古以后的历史学家不是绝无仅有的个案,这是中国古代极为发达的史学中最薄弱的一环。

史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从早期佛教的传入直到南朝佛教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完成之时,这种来自异域的文化随着印度佛教典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传入中土,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国发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我们仅仅从外典中的记载所得到的一点支离破碎的印象所无法完整重构的。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公元后的第一个一千年里最重大,同时也是对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领土上的人民的未来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的传入。

对于佛教史的研究来说,其基础仍然是文献的整理,在这一方面老一辈的研究者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比如中国 20 世纪前半叶,真正具有现代学术意味的中国佛教史学研究是汤用彤先生在极为深湛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种例子在当时还有很多,像陈垣先生的佛教史研究^①,陈寅恪先生对《梁传》的笺疏(未完稿)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佛教对中国古代音韵学和佛教故事类型对中土叙事风格渗透的精湛研究。吕澂先生和支那内学院对佛经的整理^②,以及对佛教目录学的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史的梳理^③,这些工作的直接结果就是《藏要》的出版^④,为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佛教研究最可靠的版本。对于疑经、伪经的研究国

① 陈垣先生佛教史学著述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释氏疑年录》,其中后一书考定自晋至清初 2800 名僧人的生卒年,为佛教史学研究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

② 其中包括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正理门论》及梵文《楞伽经》等佛典,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中,发现《摄事分》的大部分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因此探明瑜伽一系学说真正来源为原始佛教,它为研究瑜伽系的渊源和大小三乘佛法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在佛学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他更订正翻译后弄乱的《杂阿含经》次第,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并在《瑜伽师地论》里发现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

③ 可参吕澂《支那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划》,内学院 30 年代曾经遵照杨文会居士遗愿,编撰《精刻大藏经目录》,方法是以《开元录》为基础,比勘其他各种经录,校正其中错误,直到中国汉传佛教最后一部经录《至元法宝勘同录》都应用此一方法,并校以藏文文献,故而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项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吕澂先生,其目录学的重要成果是《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完成,这部新编经录的特点第一是以佛教最终形成的大乘学说体系着手重新设定了大小乘三藏的区分部类问题,对于某些经典的归类不当作了纠正;第二是对一些旧有经录的有译无译经本进行核实,像《开元录》这样素以精审著称的目录学著作,吕氏犹且勘出其错处超过两百余处;第三是对疑伪经的鉴别。此经录收于《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三册。

④ 《藏要》是支那内学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部丛书共收书七十种,共四百余卷,它从历朝大藏经中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著作,精加校勘,又同梵、藏文佛典作细致的比较研究,从而使《藏要》成为佛教思想研究极具影响力的一套丛书。

内的著作最有影响的是张心澂先生的《伪书通考》^①，共辑录辨伪佛经多达四百一十六种，代表了当时学术界此一领域的最高水平。在这样一种严谨的风气影响下，甚至像是周一良先生这样并非以佛教研究著称的学者，其写于此一时期的博士论文《唐代密宗》^②，也秉承着这样一种严谨周密的研究方法，此书的主要部分是对赞宁《宋高僧传》中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密教大师传记史料来源的甄别和内容的疏证，正是这样谨严的学术态度使这本“发表在五十年前的论著仍然代表着我国学者研究早期密宗史的最高水平，迄今无出其右者”^③。这些中国佛教史学的拓荒者，他们所做的工作无一不是先由文献的处理开始，逐步展开自己的学术命题。此种厚实质重的学术风气，一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当时欧美佛教学术研究界主流的影响。

西方佛教研究界，大体仍是以文献学之研究为核心及主流。究其原因则是由于西方宗教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也就是如果要研究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宗教或者历史文化，则一切都应该置于可靠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在这里古希腊文、拉丁文的翻译和校订成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而这个传统也被带入了佛教的研究领域里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佛教研究者大体是以梵文与巴利文的文献研究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的，这种传统几乎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叶^④，而到

① 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版。

② 此论文 *Tantrism in China* 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第八卷（1945年）第3、4号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8, March, 1945, Numbers 3 and 4）。此书1996年由钱文忠先生译出，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③ 出自钱文忠《译后记》，《唐代密宗》页124，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版。

④ 此方面可以参考狄雍（J. W. De Jong）的著作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其中文译本由霍韬晦先生译出，即收于蓝吉富先生主编的《世界佛学译丛》第七十一本之《欧美佛学研究小史》。其中有对毕尔诺夫（E Burnouf, 1801 - 1852）的梵文与巴利文研究的介绍，页19 - 26，台湾华宇出版社，1984年。另一位对印度古文献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迈克思·缪勒（Max Muller），确切地讲他不是一位纯正的佛教学者，而是印度学者，他的主要贡献是编定了六卷《吠陀经》和五十一卷《东方圣典丛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对于欧美佛教研究之介绍性书籍，据笔者所知，另可参考 William Peiris 所著 *The West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 Delhi, Moti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s, 1973。此书以人为单位来逐个介绍西方重要的佛教研究者。另 Narendra Nath Bhattacharyya 所撰的 *History of Researches on Indian Buddhism*,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81。此书以类为分，介绍了印度佛教研究史的各个方面。此书第一章为概论；第二章关于历史（转下页）

了十九世纪末随着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的成立^①,此种由语言入手的研究思路已经完全形成。早期一些佛教研究界的大师级人物中兼及汉文者也以翻译校定汉文本为其出发或归宿。比如法国的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 - 1832),这位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文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就有关于佛教汉文文献的部分,比如他对法显《佛国记》的翻译^②。而他的继任者,也就是著名的儒莲教授(Stanislas Julien)则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翻译了玄奘的传记^③。而对中国早期佛教的传入的文本研究者就有白鸟库吉、羽西了谛、沙畹(Edouard Chavannes)、马伯乐(Henri Maspero)、弗兰格(Otto Franke)、德效骞(H. H. Dubs)、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等等。目录学的研究有常盘大定^④,佛经中伪经的研究有法兰西学院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对唐代特别是武后一朝伪经的关注,稍后还有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对疑伪经的甄别。至于日本学者的疑伪经研究则时间更早,如深浦正文^⑤,到了七八十年代更有牧田谛亮^⑥、镰田茂雄^⑦等一大批学者。

经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佛教文献研究在大陆本有吕澂和内学院奠定的良好基础,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深潜持重的优良学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没有得到继续,理论和概念先行的研究模式较为流行,这对于佛教文献的整理冲击不小,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佛教

(接上页)上的佛陀与其早期教义;第三章为佛教结集与部派研究;第四章为大乘佛教研究;第五章为佛教哲学研究;第六章为密教研究;第七章为中亚佛教收集品的研究;第八章是巴利文的不同版本与翻译;第九章是汉藏史料中的印度佛教研究;第十章为佛教石刻与考古;第十一章是佛教艺术与图像学;第十二章是历史角度的佛教研究;第十三章为佛教的社会与功能性研究。此书大体属于概述性,但比起狄雍所著要更详细一些。

① 此一协会由里斯·戴服斯(T. w. Rhys Davids, 1843 - 1922)于1881年成立,成立之后作了大量的巴利文原典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而梵文原典的研究情况则可以参考狄雍《欧美佛学研究小史》第二章,页28 - 30。

② *Foc Koue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de Fa hian*, Paris, 1836. 此书在其去世以后方才出版。

③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Paris, 1853,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de Hiouen-thsang*, Paris, 1857 - 1858.

④ 常盘大定《后汉至宋齐译经总录》,东京国书刊行会,1938年第1版。

⑤ 见深浦正文《佛教学之诸问题》中《伪经的意义》一章,岩波书店,昭和十年(1935)。

⑥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昭和五十一年(1976)。

⑦ 见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第一节《南朝时代的疑经》,台湾佛光书局,1993年。

研究当然也包括佛教文献研究完全陷入了停顿的状态。然而在同时欧美以及东瀛日本的汉学家们,他们在这种一切推论都建立在细致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的良好传统下,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比如完成于五十年代初期的戴密微先生的巨著《吐蕃僧诤记》,该书主要内容是关于汉僧摩诃衍同印度僧人莲花戒在八世纪末的一场宗教辩论的汉文史料,以及史料的详细甄别和研究。对于此书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评语是:“书中有许多学识横溢的注释,每一条注释都堪为百科全书的一重要条目。”^①谢和耐教授本人为戴密微先生的弟子,也于四十年代末完成了中国佛教经济史方面极有影响的巨著《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此书对历史文献也有精湛的研究。五十年代末荷兰的许理和先生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aeval China*)。对于此书大多数学者可能只是注意到了作者极为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然而却容易忽视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是在文献学方面,作者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文献附录,还对这些文献做出了令人惊异的详细甄别,这些工作即使是对一个母语为汉语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端困难的,正是在这样的艰辛努力下,才使该书能在问世半个世纪以后仍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为数不多的、最权威的几种著作之一。

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国内学术事业逐渐得到了恢复,佛教研究也是如此,这种对文献的研究尤其是以大藏经的研究最为突出,像方广锬、李富华、吴梅等几位学者都对大藏经的结集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陈士强对大藏经的目录提要也是极具有学术分量的工作。另外一件意义深远的工作就是大陆版《中华大藏经》的编撰。还有中华书局、江苏古籍出版社^②为代表的一些出版社对于一批重要佛教典籍的校

^① 参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者提要》一百零九页引《*T'oung Pao*》Vol. 65 No. 1—3, 1979年。

^② 中华书局有《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第一辑计划出书二十余种,主要是重要典籍的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有《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其中佛教部分包括《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敦煌禅籍录校》;上海古籍则以影印佛教典籍为主,对于重要的佛教典籍大多影印出版,极便于学者利用。

勘整理^①,这些都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有一些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学术的最前沿。而可喜的是还出现了一些以各大学及社科类研究所为依托的佛教文献研究的学术团队^②。然而即便如此,大陆目前佛教文献学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我们很多领域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超越或达到中外学者 20 世纪 40 年代的高度,即使是和一些并非以汉语为母语的外国研究者相比,我们在一些领域还是处在十分落后的地步,比如佛教的疑伪经研究,自张心澂、吕澂先生以后,遂后继乏人^③。其原因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此一领域的研究中断的时间过长,从而导致了优良学术传统的丧失,尤其是研究梯队的断层,以今日佛教文献学从业人员的数量与整个佛教研究界的对比,以及我们已完成的文献整理与尚待整理的大量工作相比,今天的佛教文献学只能任用任重道远四字加以形容。

佛教文献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整个佛教研究领域的基础,没有此一领域里对旧有材料的校勘整理、新材料的发现和运用,整个佛教研究界都会面临资源枯竭的窘境。而另一方面,佛教文献的每一次重要发现也都会或迟或早地引来其他领域的推进与突破。希望本文的写作也能对于此一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① 佛教文献的整理有郭朋《坛经校释》、《坛经对勘》;杜继文《大乘起信论全译》;杨曾文《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神会和尚禅话录》;韩廷杰《三论玄义校释》、《成唯识论校释》;方广钊《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敦煌佛教经录辑校》、《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 698 号-斯 8400 号)》;方广钊主编,华方田等人为副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第 1 至第 6 辑等。

② 这包括四川大学中文系项楚先生为核心的宗教文献学研究,其侧重点是民俗佛教与敦煌佛教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东语系季羨林、王邦维为核心的佛教交通史学文献的校勘;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允吉先生指导下的佛教历史文献和变文的研究;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先生为核心的从佛教语言学角度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和整理等等。

③ 此方面布斯韦尔(Robert Buswell)等对疑伪经的专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是《中韩两国禅意识形态的形成:以疑伪经〈金刚三昧经〉为中心》(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 The Vajrasamā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及在 1990 年编辑出版的《中国佛教疑伪经》一书(Robert Buswell ed.,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日本也有研究疑伪经的传统,国内早期对此问题的关注有些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比如梁启超对《起信论》的研究等等。日本学者比如牧田谛亮等的贡献在于不仅仅局限于佛教的辨伪,更进一步对制造伪经的思想原因作了很多深层次的探究,这一点尤其值得大陆学界借鉴。而台湾学者对此方面较集中的研究者是王文颜,其著有《佛典疑伪经研究与考录》,文津出版社,1997 年,大陆则无专书面世。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范围、目的

慧皎《高僧传》(本文以后一律简称为《梁传》)对于中国文化史的重要意义,自从它诞生以来,在中国并没有被很清楚地认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强烈的个性。即使是像佛教这样来自异域的文明,在历经公元前后进入中原,到公元后一千年左右开始在中国逐渐退潮的漫长融合的历史之后,这种异质的种子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却还是自始至终都受到固有文化因素的排斥和冲击,最终被逐出了社会主流之外,成为一种民间的、潜流的、非正统的思想因素。这个过程又在官方的史学系统中遭到人为的漂洗,使得今天对早期佛教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渗透与影响既不能在宏观上加以正确估量,也不能在细节上得到足以还原生活的珍贵片断。

这种历史的遗失,尤其是在早期佛教史的研究领域里显得更加严重,在这里我们对于隋唐以前的佛教史,最可依靠的、集中的材料就是慧皎所著之《梁传》。然而国内对于《梁传》的研究还是处于一个与其重要性不相符的地步。这首先表现在对《梁传》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前半叶,在研究领域上主要集中在佛教史的某些领域里。另外一些基础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比如目前出版事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大藏经的日益普及,在 20 世纪初还是连少数专家都难谋一面的《高丽藏》、《赵城金藏》等等珍贵大藏经版本,现在已经由于影印本的印刷,变得非常常见。再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几种大藏经电子版的出现对于佛教文献的整理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这种电子文档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学术界的冲击一些敏感的学者已经有了一些感受。其实对于大陆学者而言,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将近三四十年的学术断层所造成的落后局面,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电子版出现所带来的契机,目前佛教研究界由于断层带来的滞后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会有所改变。现在学术界《梁传》的通行本是汤用彤先生生前未完成的一个整理本,对于此本的得失我会在以后版本的相关章节提到,无论如何,对

于像《梁传》这样重要的古籍,仅有一个校点是不能与其重要性相称的,虽然国内《梁传》的笺疏早已由国家立项^①,可是时至今日却还是没有出版,相对于《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这样一些校笺本而言,《梁传》的研究明显处于落后状态。

此文的选题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个人原因所致,自从2003年入学以后我就一直对佛教史学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最早读僧祐《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开始,直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佛教目录学著作,在系统地读了《梁传》以后,遂对《梁传》的整体编撰过程和体例有了研究的意向,就开始在史料的采撷和比对上下了工夫,并大致在此期间开始了《梁传》的校笺。工作共完成三分之一左右,由于并非文献学方向,不能将之作为毕业论文,经过与导师协商后将论文题目定为“慧皎《高僧传》的研究”。由于我对《梁传》与《祐录》、《名僧传》这两部对《梁传》影响最大的著作的材料比对已基本完成,所以研究主要是在史源学的领域,这也是与我希望全面整理《梁传》的计划有关。

到了2005年6月陈允吉师到南京大学参加张宏生教授的博士生黄先炳先生的答辩,告知黄的毕业论文竟然也是《梁传》研究,而且主要也是史源学研究。值得庆幸的是黄的论文基本上只做了《梁传》与《祐录》、《名僧传》以及《冥祥记》的比较研究,史源部分还有可以深入的地方,故而没有放弃此一专题。但是出于避嫌的考虑,将原文中与《祐录》的比较部分作了很大的精简,使得文章原来的完整性有所破坏。为了不使研究的视野过于狭窄,就又增加了部分社会学研究的计划。关于佛教史传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大陆尚处起步,国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理论架构分析的研究阶段,我尝试利用母语的优势,以文献为基础在微观层面比较佛教神异与道教法术的异同,在宏观层面探索一下佛教法术神异对于佛教传教本身的意义,希望借此得到一些不可或缺的反馈,也收抛砖引玉之效。另外由于此一领域以前较乏问津,加上笔者自身学术结构上的缺陷,只能勾勒出一个初步的轮廓,如果能由此引起学界对此一方面的注意就已经达到我的意图了。

^① 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2000年,董志翘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在语言学方向。

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梁传》及相关文献的文本研究,包括对《梁传》成书的研究,以及《梁传》与外典的比较等等;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对《梁传》中的神异方面题材的社会学研究。

本文的研究目的与切入的角度有关,主要是希望通过此文的写作了解佛教史学与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相同和差异。佛教史学首先是一种宗教史学,这种史学的作者首先很多都是信徒,由于对佛教神圣物的依赖、敬畏,违反神意时必然产生的羞耻感、罪恶感,以及由此引起的内心和肉体的忏悔、自赎都是普通人没有的。这些佛教徒由于信仰的关系,他们撰写佛教史传的目的和外典史学完全不同,大多数是为了宣教和辅教,这一点对于成书的影响尤其巨大。就受众而言,这种史学著作的假想读者也须研究,这个群体也和外典的读者不同。而就佛教史传的传主而言,都是佛教的僧众、尼众以及部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居士或其他人员。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佛教这种宗教占有了他们精神生活的绝大部分或者是全部,外界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全然让位于内心的观念世界,这些也不是非教徒所能想象的。简而言之,由于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信仰者对待世间万物的观察角度和方法都与普通非信仰者有所区别,佛教的史传也是如此,这其中必然要牵涉灵魂观念、神灵观念这些观念层面的东西,以及宗教的法术、禁忌、祈祷和献祭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会把佛教史学仅仅当作历史来研究了。如果单纯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研究佛教史传,我们就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认为佛教史传是全然的信史,把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毫无保留地当作历史中的的确确发生过了的事件来加以采信;或者干脆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一看见这些史传中有一些超越世俗世界的描写,就把它当作是疯癫病人的呓语而全盘否定。这两种情况在当今史学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笔者也未能免俗,希望本文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剥离那些积聚在佛教史传外围的人为的附属物,还原其本来面目的过程。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对于《梁传》中的神异记述作一番社会学的梳理,这里面的写作意图就是探讨《梁传》中所记载的佛教神异和佛教法术其背后的社会学内容。此方面的尝试是为了避免将慧皎《高僧传》的研究单纯限制在文献考据的领域内,如果仅仅从此一视角出

发,就会有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

第二节 研究综述

对于早期僧传,最早最系统同时也最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者是现代中国佛教史学的奠基人汤用彤先生及另一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汤先生对唐以前佛教史学的研究应该是在三十年代或者更早,也就是在其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之前^①。此一时期汤先生对《梁传》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可以从一篇短文中得其大概。也即其作于1937年的旧文《评日译〈梁高僧传〉》^②,文中对常盘大定博士所译《梁传》中的注释部分提出批评,指出其中“疏漏极多。或常盘博士因年高未亲加指导,以至所采材料,所考事实,所用版本,均有问题,不似中国佛家史专家研究有得之作,故注释方面恐于初读此书者益处甚少”。并以《摄摩腾传》具体为例指出其注释疏略而不能得史料之渊源,征引讹误又不能知事理之梗概。对于版本则指出虽引《高丽藏》,却于丽藏本之讹误失于校正,对于常盘大定所作的《梁高僧传解题》也提出相应的批评。而稍后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史料之翔实、考证之精核、立论之高迈,时至今日依然无人能出其右。此书虽非倾力于佛教史学之撰述,然而于此仍有极为精彩之论述,其书之十五章为《南北朝释教撰述》,其中第四节为《史地编著》,共分五类述之,一曰释迦传记,记佛祖事迹;二曰印土圣贤传记,龙树提婆传之类;三曰中国僧传,有别传、类传、一时一地之僧传、尼传、感应传、通撰之史传等等,毋庸讳言,分类之标准并不统一,此为其微瑕,未足为病也;四曰佛教通史,《魏书释老志》、竟陵王《三宝记传》、北周净蔼之《三宝集》等等;五曰名山寺塔记,慧远《庐山记》、昙宗《京师寺塔记》;六曰外国传志,即道安《西域志》、法显《佛国记》等等;七曰史

^① 此书最早由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次印刷。

^② 汤用彤《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汤用彤集》,页1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料之保存,如僧祐《诸寺碑文》、梁元帝《内典碑铭集林》等等。第五节为《目录》,分叙《长房录》所记之早期经录,以及僧祐《出三藏记集》所载之《道安录》体例等等,并指出早期经录的迭出是由于聚书之习也^①。对汤先生的史学成就自然毋庸后学置喙,这里要指出的是早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他就已经为今后佛教史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理论框架之宏大、具体资料之富赡、逻辑思维之缜密,都是佛教史学史上一篇典范之作。汤先生晚年曾经准备重新整理《梁传》,然而天不假年,此一工程未能完成^②,其遗稿后由汤先生哲嗣汤一玄先生于1987年整理出版,即今之中华书局题名“汤用彤校注”的整理本《梁传》,此书大部工作为乃父所为,且包括一个附录论《高僧传》的题名、著录、慧皎的题名、事迹。而汤一玄先生则又为之编制了僧名索引、人名索引以及书名索引,使本书的研究与利用变得极为方便。毋庸讳言,由于这是汤先生的未竟之稿,故而仍有若干可以提高之处,比如此书之整理竟然没有一份较为详细的版本说明和校勘凡例,仅有一份1963年油印征求意见稿时的简略说明,这是略显不足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样,此书同为今日学者致力佛教史研究者之案头必备之工具书。

三十年代曾经对僧传作过专题研究的还有陈寅恪先生,这是不太

① 详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页431-44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② 据中华书局整理本《高僧传》整理说明:“他(笔者注:指汤用彤)多年来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有关《高僧传》的资料,想将其校勘整理出版。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得以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一九六三年九月始进行全面整理,至当年岁尾,将开头六个僧传及三个附录整理成稿,作为样张油印出来,征求意见。不久因心脏病加重而住院,一九六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逝世,整理工作只得停顿。为纪念汤用彤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我于一九八三年初接着进行整理并成稿。”又据其整理说明:“遵照汤用彤先生所写简略说明的原则精神,作了如下整理工作:‘一,将校注由原来双行夹注改为注码统一编号,排在每传之后。二,原整理资料之标点不尽合理,且有错漏,故对全稿进行重新标点。三,对若干有关史料之考订和解释的校注作了核对及标点,并增加和改正了少量校注。四,原整理资料仅对卷一至卷十一的校勘作了选取,这次整理成稿时作了删减,并对卷十二至卷十四的校勘作了取舍。成稿之后,根据‘宁阙勿滥,去芜存菁’的原则,对全部校注又进行了两次筛选,共删去了两千余条校注。五,《高僧传》原来只有各卷分别的僧名目录,格式亦不尽一致,查阅颇为不便。现在参照各卷目录及金陵本目录,编订了总的僧名目录,置于书后。同时取消各卷目录。六,原来各僧传文字均未分段,这次整理成稿时作了分段。”由此可见此书之整理似仍为汤锡予先生所为,而一玄先生所作的主要是后期工作。然而毕竟是未竟之稿,故而难免有遗珠之憾。若以偌大之著述中可挑出数十处或者更多一点遗憾而加以诟病,实为有欠公道。